

育丛书

陶行知论德育

四川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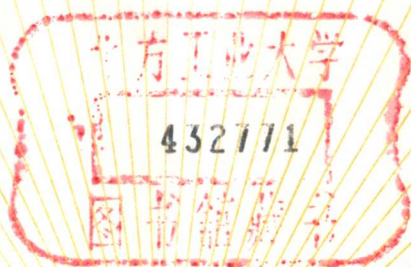
G410
3

陶行知论德育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Y0302422



四川教育出版社

(川)新登字005号

责任编辑: 韦其珉

封面设计: 张子云

陶行知论德育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3.5 插页4 字数260千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350 册

ISBN7-5408-1669-4/G·1624 定价: 4.98元

出版说明

“德育丛书”系资料性读物，集中编选了有关德育的一般基础理论和参考资料，力图使读者对德育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和轮廓性的了解，以适应德育教学和研究以及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这套丛书从1983年开始出版，已出十二册。

这套丛书是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由“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组织省内高等院校编写的。编委会顾问为胡晓风，主编为张凤山，副主编为卢自德、张润瑞、张明锦。四川教育学院受委托具体组织这项工作。

这本《陶行知论德育》由四川教育学院负责编选，该院科研处、教育系并予资助。参加编选工作的同志及其分工如下：

主编：姜文淑、钟立德、文忠曲。

第一编：钟立德、吴先正。

第二编：姜文淑、王川。

第三编：文忠曲、罗智超、钟璞。

第四编：卢忠敬、钟杨。

全书由张凤山同志主审并写导言。胡晓风、胡国枢等同志对本书编选工作十分关心并予以指导和帮助。

借此机会，谨向本丛书入选文献资料的作者以及有关院

校党委和关心、支持这项工作并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一年三月

序

当前，德育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德育科学化问题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德育丛书”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新情况而编辑的。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战略方针提出，要求组织起有战斗力、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宏大队伍，尽快实现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全国青少年中的普及。要实现十二大提出的这一任务，需要做很多工作，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普及德育科学知识。“德育丛书”的编辑出版，就是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服务的。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概念，是根据青少年特点，启迪学生思想、调节学生行为的一项重要工作。德育和其它工作一样，都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都要接受科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德育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品德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在学校里普遍开展德育教育，开设马克思主义德育学这门学科是非常必要的。鉴于目前全国还没有一套统一的、完

整的、系统的德育教材，我们选编出版这套“德育丛书”，以应普及德育科学知识之急需，满足学校政工干部、教师和广大青少年教育工作者以及学生家长的需要；同时，它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德育学提供部分研究资料。

德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具有一定的禀赋、思想、感情和理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情趣。他们不仅处在学校干部、教师和职工的教育影响下，而且还处在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思想政治工作几乎渗透学生的全部生活，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此，德育科学是一种范围极为广泛、内容极为丰富的规范化体系。德育是否能具有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决定于客观的社会需要和德育工作的发展水平。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帮助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德育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本质特征。应该要求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了解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发展过程，明确献身于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从而自觉地培养自己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和遵守革命纪律，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人生观。总之，德育体系包括学校教育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纪律的教育，它既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校教育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共产主义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马克思主义德育科学和许多科学门类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它是建立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美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基础上的，党性很强的一

门综合性的科学形态。我们虽然有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但对于德育这门学科还缺乏认真总结，还没有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因而，建立德育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这套“德育丛书”的编辑出版仅仅是一种尝试，首先初步编选德育的一般基础理论和有关资料，以使读者能对德育有一个轮廓的了解；下一步将分别在德育课教学、德育学术论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经验等方面组织编写，力争尽快与读者见面。我们希望它能引起德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重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德育教学和德育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尽菲薄之力，并希望听到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和宝贵建议。

胡 晓 风

教育大计，教育为本 ——《德育丛书》再版序言

乘《德育丛书》再版之际，我想再补充一些意见。

在古代，研究道德的学问叫伦理学。德育是伦理学在学校里的运用。道德是人类追求理想的社会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伴随着历史变化着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以及德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是长期争论不休的几个问题。我们的《德育丛书》，我们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从各个方面，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教育的实践，给予科学的回答。

德育的目的和学校教育的目的必须一致。德育的目标就是学校教育的目的，根据学校教育的目的决定德育的内容。学校教育的目的又往往是和办学者拥护的社会理想相吻合的。因而不同社会理想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和不同的德育内容。德育最能体现教育目的和办学者的社会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育是学校教育的核心。

教育在学校里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德育总是伴随着智育和体育成为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讲德育是核心，它总是以智育、体育的协同全面发展为条件的。没

有全面发展的其他方面作条件，德育也只能陷入空想。必须牢记，德育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核心。相对而言，智育和体育都是全面发展的基础。德国的教育家赫尔巴特(1776~1841)的德育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他在1804年发表的《论世界的美的启示为教育的主要工作》的著名著作中开头讲的两段话对我们还是有启迪作用的。他说：“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因而，赫尔巴特的德育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德育，教育的唯一整体”。尽管对这个命题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或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对德育在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

赫尔巴特反对单一的道德观。他强调道德的整体性，他认为道德行为有五个特殊的方面，缺少一个方面它就不完善。第一是内心自由的观念，第二是完善或完整的观念，第三是善意的观念，第四是法权的观念，第五是正义的观念。这五种道德观念既适用于个人的道德也适用于社会的道德。他强调这五种道德观念构成了道德的整体，其中任何一种观念就其本身来说都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不好的。他还强调“学生认识到的一切应当是一个统一体”。他抽象地把道德归结为真善美的统一。尽管这些内容是否正确，是否全面，都还值得研究和探讨，但强调德育的整体性却是十分重要的。正和我们强调学校教育的整体性同样重要。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去充实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构成德育的整体，让学生在德育整体中，在学校教育整体中，甚至在社会整体中，从多方面吸收道德的营养，自觉地指导自己的行为，自觉地

规范自己的行为。缺乏这种整体思想的指导，突出一点，不计其余的德育方法，将是十分有害的。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因为其社会理想与教育目的总是各不相同的。德育总是与教育目的直接关联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讲过，“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这三大类就是封建主义的道德、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他还说：“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这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影响必然渗透到学校教育整体的各个方面、贯穿于德育之中。在阶级社会里，德育总是受阶级斗争的制约。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这是指德育的特殊性，这是受阶级斗争制约的特殊规律。

恩格斯在作出上述论断的同时还讲到另一方面：“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这就是说，人们在阶级社会里除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外，还有另外许多群体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些相互关系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意识和行为规范。针对前述受阶级斗争制约的特殊规律而言，这里讲的就是指不受阶级斗争制约的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育的一般规律是不直接受阶级斗争所影响。德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是同时存在于德育的统一体内。他们是相互影响的。德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注意

特殊规律，更要注意一般规律，并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他们预见到未来人类的理想，他们确立的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学说不仅仅是教育学说、而且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因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目的，只能是培育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新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就是培育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德育的概念也应该与培育四有新人的整体相适应。因此，德育应该是学校教育整体的核心。培育四有新人是学校教育的核心，也是整个青少年教育的核心。德育总是与教育目的整体相适应的。绝不能把德育分割为“四有”新人的四分之一来对待。德育的概念可以扩大，德育与学校教育关系的提法可以变化，但德育在学校教育整体中至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教育学中最一般而又重要的规律。

教育大计，德育为本。但愿《德育丛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善于总结改革中的新鲜经验，把握住德育这个核心，按照学校教育的规律，为培育四有新人，为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为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德育学一定會在改革中间世。

胡晓风

1987年国庆于成都

《陶行知论德育》导言

张凤山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德育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他的德育论著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革新精神和民族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息息相通的德育理论。学习、研究陶行知德育论著，对加深“把德育放在首位”的理解，对加强改进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德育科学，以至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说陶行知的德育论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息息相通的德育理论，是以我们对陶行知德育思想基本特征的认识作为依据的。我们认为陶行知德育思想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陶行知德育思想是富有革命精神的进步思想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我们都知道，陶行知是坚决反对旧传统教育思想的，但他并不一概否定传统，而是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他说：“我们只问是非好坏，不问新旧宽严。是的，好的，虽旧必存；非的、坏的，虽新必除。”〔1〕如“天下为公”，“民贵君轻”思想，他用之于教育，发展为“文化为公”，“教育为公。”〔2〕而这里的公，在陶行知的论述里是有

确定的阶级内涵的。这就是“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3〕

“努力发展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教育”。又如在他对培养目标的论述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做人中人”，而不是培养“人上人”。他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中说：“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入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4〕这是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有力批判。但在解释“人中人”时，他又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他说：“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又如，他在《新大学》一文中，对“大学之道”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新大学是什么？新大学是大众的学府。”“《大学》里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从前的‘大学之道’。新的‘大学之道’就不同了。依照新的眼光看来，它就变成了‘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新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6〕以后，他又进一步将“新民”改为“亲民”，并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时解释说：“社会大学之道，要亲近老百姓。……我们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确是他们的亲人”。〔7〕经过他这一改动，一解释，《大学》中这一名言，就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这同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多么一致。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他是我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家中最善于把先进的教育思想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融汇贯通，古为今用的典范。

第二，陶行知的德育思想，是以先进的政治理想和坚定

的政治信念作为基础的，具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激越的战斗精神。陶行知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从民主主义战士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早在1932年3月，陶行知就与蔡元培、李公朴、陈望道等一百多人共同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大会，宣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936年5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以及各地救亡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成为救国会重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6月，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来救国会“七君子”以“爱国罪”被捕入狱。陶行知虽远在国外，也以“危害民国，宣传与三民主义不容的主义”的罪名，被国民党政府通缉。1936年10月，陶行知在伦敦时，曾瞻仰马克思墓，并作诗一首：“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8〕表达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崇敬和信仰。1946年，全国已处于“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将向他射来的“第三颗子弹”大义凛然，战斗不止。周恩来同志为陶行知去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陶先生作了这样的评价：“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9〕由于有先进的政治理想作为基础，陶行知德育思想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坚定的，主要表现在：

（1）培养目标的进步性：他把“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10〕当作教育的根本任务。求什么真？

做什么样的真人？在他对学问与革命，求真与献身的关系的论述中，讲得非常透彻。他说：“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在学问上忠于真理的，则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所以，“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11〕(2)德育内容的人民性。陶行知在论述德育内容时，总是把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结合起来，把私德与公德联系起来加以阐述的。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德”的概念，极大地丰富了德育的内涵。他说：“有道德的人，既要有公德和私德，而且还要‘明大德’。什么是大德？‘大德’是大众之德，大众之德有三：一是觉悟，二是联合，三是争取解放。”〔12〕以后，他又加了第四，创造。〔13〕可见，陶行知讲的“大德”，就是觉悟起来，联合起来，争取大众的解放，改造旧世界，为大众创造幸福的崇高的道德境界。(3)德育途径的实践性。他强调学生要到老百姓中去学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他说：“必须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否则，我们便没有理由希望他们成为未来的建国人才。”〔14〕在李公朴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后，他号召：“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培养一万位民众新战士来顶补。”这样，“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15〕

第三，陶行知的德育理论与实践，充满了知行统一的哲学思想和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原理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不仅用之于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而且也适用于伦理道德的修养，他给“做”下了这样的定义：“‘做’是在劳力上劳心。因此，‘做’含有下列三种特征：（一）行动；（二）思想；（三）新价值之产

生。”[16]这是陶行知“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17]的哲学思想在教育中的发展。不仅如此，他还主张：“仅用脑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变成兼用手的工人；仅用手的工人、农人等都变成兼用脑的知识分子。”[18]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消灭体脑差别的共产主义学说是相通的。陶行知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注重实行。他说：“修身伦理一类的学问，最应注意的，在乎实行。”绝不能“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行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的标准。”[19]“嘴里念的是劳动教育的书，耳朵听的是劳动教育的演讲，而平日所过的是双料少爷的生活。”[20]要除去这些弊端，“非给学生种种机会，练习道德的行为不可”。他还十分重视学生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他认为“若办得得当，可算是实验的修身、实验的伦理，全校就是修身伦理的实验室。”[21]陶行知德育思想之所以感人至深，令人信服，是他的言行一致，以身垂范。他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22]的无私奉献精神；他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师”[23]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他的“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24]的博大的胸怀和甘为“人梯”的精神；他“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25]的开拓创新精神；特别是他一贯提倡和弘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正气等等，在他一生中都得到了彻底的实践和完美的体现。宋庆龄同志称颂他为“万世师表”[26]，是对陶先生一生的高度赞扬。的确，陶行知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正是他闪耀着共产主义精神的崇高师德。这师德既是